

苏联—俄罗斯科技哲学价值论思潮研究

白夜昕^{1,2}, 陈凡¹

(1. 东北大学文法学院, 辽宁 沈阳 110004;

2. 哈尔滨师范大学科技、文化与创新研究中心, 黑龙江 哈尔滨 150080)

摘要: 通过分析苏联—俄罗斯科学技术哲学领域内价值论思潮的兴起、发展和鼎盛过程, 指出由它引发的俄罗斯科学技术哲学领域内多元论格局的现状, 并进一步从政治、宗教、世界思潮等角度分析价值论思潮的成因。

关键词: 价值论; 人道主义; 多元论; 工具理性

中图分类号: N0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5680(2005)06-0081-03

苏联解体至今已经有13年, 在对这段历史进行反思时, 人们更多关注的是与此相联系的政治、经济、军事以及文化等方面的变化, 并从这些方面分析这段历史的成因。与此相反, 很少有人关注科学技术哲学领域内价值论思潮的兴起。而事实上, 正是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价值论思潮是前苏联解体在科学技术哲学中表现出的一种征兆, 它的进一步发展导致当今俄罗斯科学技术哲学领域内多元论格局的形成。因此, 认识和分析价值论对于认清这段历史具有重要意义。

一 价值论的兴起: 挑战客观一元论标准

纵观前苏联科学技术哲学70多年的历史发展, 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 在这一过程中发生过两次重大转向: 一次是20世纪60年代由本体论转向认识论; 另一次是20世纪80年代由认识论转向价值论。站在今天的历史高度上, 我们能够意识到, 80年代科学技术哲学的价值论转向已经在某种程度上预示了苏联社会结构将要发生的历史巨变。

众所周知, 在前苏联的科学技术哲学传统中, 片面强调事实命题而排斥价值判断一直被视为天经地义的事, 直到20世纪80年代价值论思潮兴起以后, 才使情况有所改变。价值论思潮的兴起最初表现为对科学技术价值的关注, 这是由整个世界的文明危机所引发的。为了解决危机, 全世界都在

加紧探寻新的发展道路, 而这种探寻正像俄罗斯学者所说的, 它是在人类不同的文化领域, 如哲学、艺术、宗教和科学中实现的, 即通过探寻人类生活的主要基础和选择新的价值, 以保障人类的生存和进步战略的实施。^[1] 也就是说, 文明危机的解决离不开价值选择。在对价值进行细化时, 俄罗斯学者们认为, 这种选择应当满足社会价值、生物圈价值和世界价值观等方面取向的合理性。^[2]

90年代末期, 随着社会制度的转型, 俄罗斯科学技术哲学研究越来越自觉地倾向讨论价值选择对科学技术哲学研究路线的影响。库切夫斯基说: “哲学从智力上将理论知识的客观性同人们的价值观定向、精神理想结合起来, 同确定现在和未来的社会历史活动战略结合起来……哲学知识具有双重判断标准: 一是认识论标准, 它与哲学原理和范畴的客观重要性及可靠性有关; 一是人道主义标准, 它与用哲学理性表达人生价值、以及作为认识和物质实践活动主体的人的理想和志向有关。”^[3] 与此相对应, 科学技术哲学也具有上述两个标准, 前者是客观的事实性标准, 后者是主观的价值论标准。这样, 价值论标准进入科学技术哲学的研究视野, 它向以往单纯的客观一元论标准提出挑战, 因而, 致使衡量科学技术的标准由以往的客观一元论标准变为现今客观性与价值论共存的二元论标准。

【收稿日期】 2005-01-25

【基金项目】 黑龙江省教育厅人文社科研究项目“论前苏联—俄罗斯科学技术哲学研究重心的转向”的成果之一(项目编号: 10554084)

【作者简介】 白夜昕(1973-), 女, 回族, 黑龙江哈尔滨人, 现为东北大学科学技术哲学专业在读博士, 哈尔滨师范大学马列主义教研部哲学教研室讲师, 主要研究方向: 俄罗斯(及前苏联)科学技术哲学;

陈凡(1954-), 男, 辽宁沈阳人, 东北大学文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主要研究方向: 技术哲学与技术社会学。

20世纪末期,价值论已经成为俄罗斯科学技术哲学的研究重心。一些著名哲学家在各自研究文献中有关人道主义价值问题的论述,成为价值论转向最终得以确立的标志。莫伊谢也夫()指出:“接受价值和把人纳入到系统中来的辩证法是现代自然科学和整个文化最伟大的成就之一。”^[4]弗罗洛夫()在谈到价值观念时指出:“自然科学家、社会学家或技术科学的代表所具备的哲学方法论修养愈来愈深刻和丰富,当今的哲学方法论应当包括对科学活动自身的各种人道主义的、价值的和伦理因素的严肃认真的关注,用以适应从世界水平出发考虑问题的需要……”^[5]这种思想可以在康德那里找到源头,很早以前康德就曾作此结论:“科学理论和概念应当成为可测量的、并与道德、与全人类的人道主义价值相比较的东西。”^[6]前苏联时期出于赶超的需要,工业主义和技术治主义的中心话语一直支配着整个文化的走向,而在科学技术认识论中的突出反映就是把抽象的客观可测性置于人的感性需要之上,人的命运被看作是无足轻重的。苏联解体之后,随着对历史的反省,俄罗斯出现了普遍的伦理主义觉醒,以人为本成为社会的压倒性的呼声。这样,科学技术哲学中的人文因素和人道主义价值因素开始受到青睐,以致于成为科学技术哲学乃至整个哲学的核心问题。

二 价值论的归宿:多元论格局的形成

伴随着价值论的产生、发展和鼎盛过程,科学技术哲学的研究观念发生了重大变化。此时,科学技术哲学的研究抛弃了以往逻辑主义一元论,而引进非理性的认知因素(如直觉)。并最终导致认识路线上的多元论导向迅速发展起来。

首先,多元论导向在方法论方面表现为:对近代以来的在自然科学中占主导地位的逻辑主义和公理主义的背离。20世纪初,在数学和物理学中有一种信念占主导优势,这就是认为只有具有严格的逻辑结构,并从牢固的已被确认的公理基础上产生出来的、能够对概念进行修正的理论体系才是科学知识。这意味着首先只有演绎推理才具有这样的地位。^[7]该思想当以逻辑实证主义学派为典型代表,并盛行了近半个世纪,逻辑公理主义被看作是理性主义的同义语,而非理性则是信仰主义的同义语。苏联解体后,随着科学技术哲学领域中价值论思潮的深化,意识中的非理性成分的科学认识功能开始得到肯定,与此同时,直觉要素的功能越来越重要。不可否认,20世纪下半叶的计算机革命对此也起到了促进作用,电脑使人脑日益摆脱形式化、标准化、墨守成规的逻辑活动。虽然这种技术成就本身还不会导致我们所看到的方法论原理的变化,但它却揭示了在科学研究中总是存在的、但却被逻辑因素所掩盖的直觉因素的明显的重大作用。^[8]这样一来,方法论中的直觉要素甚至被给予了与逻辑要素同等重要的地位。

其次,多元论格局的形成还反映在,随着马克思主义哲学失去官方意识形态的地位,在学术研究中表现出对西方资本主义哲学家思想的宽容。90年代初,俄罗斯学者大量翻译西方著名哲学家的著作和文章,并重新对其进行评价。对西

方著名哲学家思想的大量引进,直接导致现今俄罗斯哲学界思想众多,派别林立。用弗罗洛夫的话说,当前只要西方有的哲学派别,在俄罗斯都可以找到。这说明俄罗斯哲学的研究对象呈现出多元化的特征,当然,这也包括科学技术哲学在内。

此外,多元论格局的形成还突出表现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评论的多元化。这种评价可以粗略分为三个派别。一派是捍卫马克思主义的正统观点,该派的代表人物有奥伊则尔曼()、克罗托夫()等人,他们始终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作用。

另一派是反马克思主义的,他们或是鼓吹复活传统斯拉夫东正教神学思想,或是极力倡导西方各种时髦哲学。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批评,锋芒首先指向教条主义和专制主义。他们的依据是,斯大林时期评价哲学家们的思想往往以其是否符合官方注释的“马克思主义”和是否为现行体制辩护为标准,违者就要受到迫害。^[9]前苏联哲学界对遗传学、相对论、控制论等理论的批判就是这个方面的集中体现。斯焦宾()还指出,在苏联哲学史中存在着一系列粗浅的批判和神话,哲学由于处在残酷的思想体系的监督之下而成为教条的马克思主义,这种教条的思想禁锢使哲学中不可能产生任何新的或令人感兴趣的东西。因此,整个苏联时期是完全失败的,它脱离了世界哲学思想,一味想从世界哲学思想中解脱出来。^[10]在他看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肤浅和教条的,他们在苏联生活中起着类似宗教的作用。”^[11]显然这种看法是错误的,但是人类历史的确常常上演这样的镜头:许多事物的发展往往刚脱离这个极端,就会走向与此相反的另一极端。如果说斯大林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其中的一端,那么另一端便是当前的反马克思主义哲学。

还有一派试图以新的视角“重评”马克思主义,提倡“客观公正”的“历史主义”的立场。如弗罗洛夫在谈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苏联哲学的研究状况时指出,当时哲学著作自身的风格是稍有些教条主义,但更多的是开放和自由。因此,不能把苏联科学技术的幸甚至整个社会的全部不幸都不分青红皂白地扣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头上。他说:“如果对我国哲学家在以往时期所做的一切作一个总体的结论,那么就必须明确指出,那些断言这一哲学似乎带来的只是危害,而不能带来任何确实可感知的成果的人,他们的看法是错误的,他们的思维是极其肤浅的。”^[12]应当说,对马克思主义的这种评价似乎更能代表大多数人的呼声。

三 价值论的成因:国内因素与国际因素的协同作用

纵观苏联-俄罗斯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下列因素在人道主义价值论的形成与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

首先,前苏联时期,特别是斯大林时期,哲学带有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致使当时的科学研究不是依据客观、公正和满足社会需求的原则。人们在评价某一科学研究成果时,主要考查的是该研究成果是否支持或证明了斯大林注解过的

“马克思主义”,如果不符合就会遭到批判。可以说斯大林时期的科学研究和哲学研究所采用的是压抑自由和人性的研究方式。苏联解体后,人们对这些问题进行了清算,其结果就是要求摆脱集权主义体制的控制,强调人的解放和人的自由,在哲学领域中相应表现为,反对哲学干涉自然科学,提倡公正、自由和人性的学术研究。这样,人的学术自由和人的价值问题被提高到异常显著位置。

其次,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宗教神学的复兴极大促进了人道主义价值思想的进一步发展。早在1922年斯大林就下令驱逐200多名哲学家、社会学家等,其中包括别尔嘉耶夫、弗兰克、洛斯基等宗教哲学家。在国外,这些哲学家一方面致力于对传统俄罗斯思想的继承,另一方面,又不断赋予其新的内容。尽管这些宗教哲学家们的思想各不相同,但是他们的共同宗旨是关注人、关注人的存在、人的精神和自由问题。对于个人存在的关心,在别尔嘉耶夫的哲学思想中表现得尤为明显。他把“人正论”原则——在创造中并通过创造为人辩护——作为大量宗教哲学材料和文化史材料相融合的钥匙,并以此来否定“神正论”,在他那里人被置于存在的中心。^[13]他还说:“如果设想一种完美的永恒生活,神的生活,但那儿却没有你,也没有任何人,你在那儿消失了,那么这种完美的生活便失去了任何意义。”^[14]在此我们可以感受到,俄罗斯宗教哲学对人的关心使得长期受政治压抑的公众在共产主义理想幻灭之后,试图从宗教哲学中寻求新的精神寄托。俄罗斯宗教哲学深化人道主义思想,把个人作为哲学的核心,这与西方人本主义强调关心人的生存状态,强调人文精神具有异曲同工之效。

再次,苏联-俄罗斯科学技术哲学中价值论思潮的兴起也与对逻辑实证主义的批判不无联系。逻辑实证主义,以科学语言的意义为核心,摒弃形而上学,认为形而上学命题是无意义的,是非科学的。该理论受到后来的历史主义学派的批判。历史主义学派强调,科学理论的形成和发展要受本体论、世界观等形而上学因素的支配和影响,而形而上学恰恰是文化历史的产物,它里面包含着丰富的文化因素和人生价值因素。我们在库恩(T·Kuhn)的范式理论中、拉卡托斯(I·Lakatos)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中,在夏皮尔(D·Shareper)的信念和理由的内化中,以及在劳丹(L·Laudan)的研究传统中,都可以清楚地看到这种“形而上学的复活”。可见,正是由于逻辑实证主义摒弃形而上学,才使其自身排斥人的因素,从而成为典型的“无人哲学”。现代科学哲学对逻辑实证主义的批判,深刻地影响着解体前后苏联-俄罗斯哲学思想的发展,它成为人道主义价值论思潮形成的主要原因之一。

此外,现今世界范围内对工具理性的批判,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俄罗斯科学技术哲学价值论思潮的形成和发展。马克思·韦伯第一次提出“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两个术语。在价值理性中,科学技术作为手段不断创造物质财富,以满足人的物质生活,进而满足人最根本的精神需求。此时,人成为目的。但是,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科学技术逐渐获得自主性和独立性,进而取代目的或为别的目的服务,

这样就由价值理性转向工具理性。此时,人们更多关注的是如何采用更简便、快捷的方法来实现科学技术目的。这使得科学技术由手段变成目的,而以往作为目的的人则成为保证科技目的得以实现的手段和工具。工具理性泛滥的直接社会表现就是“技治主义”(technocracy),即用技术统治人、扭曲人性并为依靠技术的暴力和霸权张目的社会倾向。对工具理性最具影响的批判要属法兰克福学派。可以这样说,对工具理性的批判对苏联哲学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上述研究表明,苏联-俄罗斯时期科学技术哲学中价值论思潮的形成不仅源自国内政治、宗教的影响;同时它也受国际大环境的影响。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哲学(包括科学技术哲学)既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而且,苏联-俄罗斯时期科学技术哲学中价值论思潮所导致的结果不仅反映在自身内容、对象、研究方法的变化上;同时,它还通过科学技术哲学指导思想的变化,间接预示意识形态可能发生的转向。有鉴于此,我们更应关注我国科学技术哲学乃至整个世界哲学领域内各种思潮的发展与演化。

【参 考 文 献】

- [1] [J]. - , 1994 (6) : 19.
- [2][4] [J]. , 1993 (2) : 66,66.
- [3]库切夫斯基. 哲学知识的本质[J]. 李国海译. 现代外国社会科学文摘, 1995(10) : 21.
- [5] . . 弗罗洛夫. 科学哲学及科学伦理学研究的回顾(1987 - 1994)与展望[J]. 安启念译. 国外社会科学, 1995 (4) : 44.
- [6] () [J]. , 1995 (7) : 36.
- [7][8] [J]. , 1995 (7) : 20,20.
- [9][12] : [J]. , 1992(10) : 89,88 - 89.
- [10][11] : - [J]. , 1997(5) : 4,4.
- [13]李昭时编译. 别尔嘉耶夫的哲学道路[J]. 哲学译丛, 1990(3) : 70 - 72.
- [14] . 别尔嘉耶夫. 我的末世论哲学[J]. 哲学译丛, 1991 (4) :24 - 32.

(责任编辑 殷 杰)